



法院联合多部门共同发力在线诉调对接 全流程网上办 一键化解纠纷

□ 本报记者 蔡长春

“针对矛盾纠纷易发多发领域,继续加大与中央有关部门‘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吸引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入驻调解平台,形成以人民调解平台为主干,道路交通、商事纠纷、证券期货、银行保险、劳动争议、网络交易、社会民生等类型化纠纷解决平台为支干,纵向贯通、横向集成、共享共用、安全可靠的在线多元解纷平台体系。”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最高法立案庭庭长钱晓晨在会上说。

其间,与会单位有关部门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各自相关工作取得的新进展,并表示将充分挖掘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巨大潜力,努力推动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常态化运转,最大限度提升解纷效能,更好服务和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成效显著

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副局长马绍刚介绍,2020年8月,人民银行推动指导下的中国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网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实现“总对总”系统对接,建立起金融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同时,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因地制宜推动构建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各省(区、市)均出台了相关实施方案,指导建立金融纠纷调解组织292家。

“此外,人民银行还积极指导各地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妥善化解金融消费纠纷,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积极推广在线调解新模式,依托中国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网等网上平台提供调解服务,高效及时化解纠纷。”马绍刚介绍说,2020年,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通过

线上方式调解的纠纷近万件。

马绍刚说,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始终坚持金融为民理念,强化协作共商,细化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机制,持续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金融领域“枫桥经验”。

一直以来,银保监会高度重视,积极推进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和诉调对接机制建设,2012年,原保监会就与最高法开展了建立保险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试点工作,并于2016年联合发布文件,将保险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一级巡视员罗青介绍说,2020年,银行业新设调解机构42家,总数为164家,覆盖4个直辖市和1138个地市(州、盟);保险业新设调解机构49家,总数为488家,覆盖4个直辖市和309个地市(州、盟),专兼职调解员达到1.4万余人。

“2020年,调解组织成功化解纠纷10.42万件,帮助消费者实现经济利益133.75亿元。其中,我们与最高法合力推进诉调对接机制建设,在该机制下成功化解纠纷4.65万件,涉及金额78.5亿元。”罗青进一步介绍说,“我们会同最高法立案庭研究制定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建设方案,目前已有28个银保监会所辖的138家调解组织开展了线上调解,调解成功2.3万件,涉及金额30.96亿元。”

在线诉调对接试点工作稳步推进

目前,各地普遍开展了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调解事项涉及总金额每年近50亿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副主任成钢介绍说,最高法、国家发改委和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标志着价格争议纠纷

调解工作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最近,国家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与最高法立案庭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机制,首批选定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重庆等9个省(直辖市),220多个市县开展试点。

“此举旨在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发挥价格认定工作专业优势,在诉前和诉中环节调解化解部分民商事案件中价格争议纠纷。”成钢介绍。

“《关于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印发是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重要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二级巡视员武晓明介绍说,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高度重视协同保护工作,大力培育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依托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快维中心、维权援助中心等机构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调解队伍,《通知》的出台将进一步规范诉调对接程序,提高社会各界对于调解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认知度,增强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公信力。

“目前,我们按照《通知》要求已推动首批167家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1094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武晓明表示,下一步,根据《通知》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将组织开展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宣传和培训等活动,大力培育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指导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开展全流程在线调解工作,不断提高调解工作成效。

总结试点经验尝试科学有序推进

“去年以来,疫情给侨企侨胞依法维权带来了诸多不便。”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权益保障部副部长马鑫说,通过建立涉侨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充分借助司法力量,发挥侨联优势,各级侨联的调解组织和

调解员通过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方式开展全流程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实现矛盾纠纷从委派、委托调解,到开展调解工作,达成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等均可在线办理。

同时,中国侨联推进涉侨纠纷在线调解机制和民间调解组织力量深度融合,拓宽涉侨纠纷的多元触角,让侨企侨胞们无论身处何地,只需一部手机、一个平台,就能随时参与调解,即使相隔万里,也能高效解决纠纷。

马鑫介绍说,为进一步维护侨企侨胞的合法权益,更大程度地发挥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作用,最高法和侨联在总结前期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并于去年12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涉侨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通知》,除前期11个试点地区外,还鼓励非试点地区积极探索应用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开展涉侨纠纷调解工作。

开展劳动争议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有利于依法维护广大职工合法权益,积极预防和妥善化解劳动关系领域重大风险,维护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

去年2月,在总结前期试点地区“法院+工会”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开展经验的基础上,最高法和全国总工会共同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正式建立起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试点地区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多点开花,取得了良好工作成效。

“今年,我们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将‘法院+工会’的诉调对接工作机制搬到线上,实现了全流程在线办理。下一步,我们还将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劳动争议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通知》,并在总结试点地区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开展情况的基础上,形成全国推广方案。”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黄龙介绍说。

意见,保障律师的阅卷权。

正确把握上诉抗诉问题

“认罪认罚只是对罪名和量刑表示认可,但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于事实部分有没有辩解的权利?”“认罪认罚后有的是‘假上诉’,为了避免送监执行,利用判决不生效立即生效的时间差进行上诉,使自己可以留在看守所执行剩余刑罚,对这类上诉是否应当抗诉?”……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和抗诉问题,是座谈的焦点问题之一。

张军认为,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他列出了几种情形——

被告人因对犯罪事实证据反悔,提出不同意见或提出辩解意见而被从重处罚的上诉,是被告人的正当权利,检察官应当尊重,不应当予以抗诉。

被告人认罪认罚,法官在幅度刑的高线量刑,或没有采纳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对被告人给予更重量刑引发的上诉,同样是被告人的权利,不应当抗诉。此外,被告人在庭上认罪认罚,但是对于罪作了审查起诉阶段没有做过的辩解,认为自己犯罪主观恶性或者客观危害性较轻,对指控犯罪的证据有的予以否认,但最终亦认罪的,检察官原则上不应当抗诉。被告人辩解或律师辩护,被告人予以配合认同,均是被告人的权利,只要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法庭总体予以采纳,没有因无事实、证据依据的辩解影响定罪量刑的,也不应当抗诉。对此类情形,检察官要从自身指控证明犯罪能力和做认罪认罚从宽审查起诉阶段的工作质量上找问题,补短板。

被告人认罪认罚,庭审采纳了确定量刑建议或者幅度刑的中线、低线量刑建议,被告人为了缩短实际服刑期,“制造二审”,延长庭审期限而不再移送监狱服刑的几个月刑罰,以上诉延长实际羁押期的,检察机关原则上应当予以抗诉,法院亦多支持抗诉并对被告人予以从重处罚。抗一案警示教育,减少杜绝此类被告人的“技术性上诉”。

胡先生告诉记者:“执法人员非常敬业,查封前和我们及时充分沟通,充分体谅企业的实际困难,所以我们也积极配合。”李律师说:“马上快过年了,在腊月这么冷的天,法院执法人员赶来帮我们继续履行权利,非常感谢,也让我们吃了一顿暖心丸。”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调度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四中院全面贯彻善意执行理念,积极化解双方矛盾,有效平衡了执行力度与执行温度之间的关系,用柔性执法彰显了司法温度,达到了定分止争的目的,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该负责人介绍说,从2020年9月下旬至2021年春节前,全国法院集中部署开展“发挥执行职能,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专项执行行动。2020年,全国法院执结涉民生案件80余万件,执行到位金额250余亿元,其中,涉农民工工资案件(不含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类案件)4余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0余亿元。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广大执行法官不忘初心、履职尽责,捍卫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王鹏说。

上接第一版 则节省了进一步证明犯罪、追诉的司法付出,立案侦查移送捕诉就会更好更早,恰恰说明了侦查起诉阶段依法追诉,运用司法政策“攻心”,矫治犯罪取得了最佳效果。评价侦查,检察人员的业绩应该与时俱进,不能简单地以逮捕起诉从重判处、从严判决来评价前期追诉工作的付出。越早能让犯罪嫌疑人认罪服法,证明办案人员的司法专业能力越强,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越好,业绩考评要给予更高的评价。

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由于值班律师作用还有待充分发挥,可能存在被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情况”“有些犯罪嫌疑人本身并不情愿认罪,但选择通过认罪认罚尽快拿到判决结果,走出看守所”……座谈会上,围绕大家关注的认罪认罚自愿性问题,张军从认罪认罚从宽的本质入手予以回应——

认罪认罚的本质在于:自愿。2020年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超过85%,量刑建议采纳率近95%,一审服判率超过95%,高出其他刑案21.7个百分点。但不容否认,种种原因,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中,当事人自愿的程度、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或反适用中具体工作方式方法欠妥,致法庭上出现——

实践中确实存在因为工作不到位,或工作方式方法简单,导致犯罪嫌疑人觉得“稀里糊涂”认罪认罚了,也有一些嫌犯,主观恶性很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没有充分的事实证据,不到他们心目中的“最后一刻”,不会缴械投降。甚至在法庭上有一丝可辩,认为有侥幸之余地时,其即翻供,指认前期认罪认罚工作带有“被迫性”。

与此同时,不少情况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起初犯傻犯,对自己行为性质的认识不是很清楚,侦诉阶段依法教育引导其认罪认罚,做到了心悦诚服,但在审判阶段,法庭辩论中有了不同意见,其辩解自认无罪或有可辩时,原认罪认罚在庭审时就带有了“被迫性”和“不自愿性”,这也与我们前期工作

上接第一版 发现近一年来几个公司走账总共有两千万元左右,这些钱足以还清所有债务。

郭海宁说:“过年期间,饭店会有大量资金进入账户。所以要及时进行划扣,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警车一路疾驰,终于在银行下班前赶到。来到窗口,法官出示证件和相关文件,银行工作人员积极配合打印该账号一年来的流水账单,发现该账号仅有5万余元。就在银行工作人员打印流水账单时,该账号又转出1万余元,银行工作人员立即冻结该账号。”

“被执行人的行为已经构成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造成执行不能,年后第一件事,我们会联系被执行人进行谈话……”郭海宁告诉记者。

而在此前一天,即腊月二十八,记者来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跟随执行法官李建勋一道赶赴执行现场。

当天中午,刚执行完一个案件的李建勋快速吃完午饭,和法官助理詹华东、王鹏,书记员荣斌一起整理着装,佩戴执法记录仪,出发前往昌平区某生物技术公司对申请人

首席大检察官答疑解惑认罪认罚适用

不尽到位有关,与庭上进一步做深做透指控证明犯罪的工作,以事实证据论证欠严谨、欠说服力有关。

实践中,绝大多数庭上甚至一审否认“认罪”的,最终定罪了,被告人认罪;有的甚至因此被抗诉,从重判处了刑罚,再再上诉、申诉,从这个角度也足以说明,主要还是侦诉阶段做深做好认罪认罚从宽工作还有不足。

量刑建议做到规范精准

“要针对不同的案件,区别提出量刑建议,不能确定刑和幅度刑一刀切”“个别检察官对从宽的标准把握不一样,出现个别案件量刑建议准确度不高”……就大家关心的量刑建议的规范化、确定化问题,张军结合案事例回应——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初期,检察官作为提出量刑建议的责任主体,经验不足,更多的是提出幅度刑的量刑建议。有的则总结庭审经验,提出了确定刑量刑建议。随着经验的积累,实践效果的展现,确定刑量刑建议提出的比例、采纳率均大幅提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罪认罚案件中,凡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的,没有一个被告人不期盼在最低线获刑。而且法官选择了中线甚至高线量刑时,律师、被告人往往提出上诉,庭审“三个效果”统一就更不容易实现了。

我们曾在一家基层法庭旁听一起案件:被告人盗窃一辆电动车,认罪认罚,量刑建议是8到12个月,庭审中,被告人最后陈述时说,如果判8个月或9个月,可以接受,要是再重就……此案当庭宣判,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被告人没有犹豫:“那我上诉”。旁听的几位政法机关的相关负责同志露出不解的神情。

检察官该怎样做到确定刑量刑建议被告人认同、律师认同,法庭采纳呢?首在全面

为了更多申请执行人过个踏实年

的财物保全进行清点。

路上,李建勋告诉记者,在这起案件中,申请人两年前第一次申请财产保全,法院当时已查封了280箱甘草次酸(价值2200多万元人民币),这次行动是因为上次查封期限届满,申请人再次提出申请,对财物继续查封。

“警车到达某生物技术公司时,申请人代理人李律师早已等候。”

李建勋告诉记者,据李律师反映,她已经好几个月联系不到该生物技术公司的负责人,财产被保全之后,也很长时间没能进来查看。这无疑影响了申请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因此出发之前执行法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大量沟通工作,缓和了双方的紧张关系。

在仓库门前,该生物技术公司的董事会秘书胡先生迎上来,与李建勋和李律师一一握手,一行人进入仓库查看货物存放情况。

这里的库房里混杂着各种中草药的味道,罗列着大大小小的纸壳箱包装的药材原料和其他萃取的产品。

走到原来封存的位置,李建勋向李律师

把握案件事实证据的基础上,对法律和相关法律解释的正确理解把握;次在对法院特别是本地法院处理同类案件典型案例的理解把握和运用;再就是庭下与律师沟通,要充分考虑律师的意见,庭上作出说明时要结合案情,被告人配合与否的表现,尊重法官定罪处刑的经验,体现以庭审为中心的改革导向。

对一些新类型案件,事实情节更复杂的重大案件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较深,深谙律师在庭审时会提出的意见,被告人肯定存在变数的案件,检察官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则比较主动。

充分发挥律师独特作用

“值班律师价值感不高,有时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流于形式”“值班律师的阅卷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围绕律师深度参与、充分发挥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的独特作用,张军分析道——

在认罪认罚从宽实践中,辩护律师在侦诉阶段接受委托,全程、全力以赴赴人的很少,大多数是值班律师在场,参与介入、见证该制度的适用。

由于犯罪嫌疑人相对多,值班律师少,且值班律师往往是采取一两天轮班的方式,很难全面深入了解具体案情。有的仅仅是“在场见证”,庭审阶段辩护律师发表了不同意见,被告人就不再认罪认罚。这类案件已引起司法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立法机关高度重视,据了解,法律援助法(草案)将对这类问题作出特别规定。我们期盼更多刑辩律师更早介入侦诉阶段介入,切实维护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

解决这一难题,根本还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律师服务由不均衡走向均等化。此外,侦诉阶段做认罪认罚从宽工作,要充分尊重律师执业权利,发挥好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独特作用,认真听取值班律师

核实时,甘草次酸存放状态无变化,徒手抬了抬其中的一箱,不大不小的箱子却十分沉重,也符合规格上写的25公斤。

胡先生对李律师说:“甘草次酸保质期5至10年,药用价值并没有因为封存而贬值。”

李律师说:“去年因为疫情,公司出口业务受很大影响,贷款还不能抵债。也是因上游企业欠我们公司的债务,我们无法及时还款给他们。”

执行人员重新清点,贴封条,张贴查封公告之后,李建勋向双方说明查封时间和查封财产保管的责任,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引导,让被申请人进一步了解自己的法律义务和责任。

“如果当事人存在沟通障碍,很可能产生抵触情绪,甚至抗拒履行或者逃避履行。执行人员引导双方当事人加强沟通,在法院主持下化解纠纷,有助于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而履行债务,保障强有力的执行。”王鹏说。

海南高院召开党风廉政教育大会

做到“七知”零容忍严惩司法腐败

本报讯 记者邢东伟 翟小功 通讯员崔善红 春节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2021年海南高院党风廉政教育大会,组织全体干警观看警示教育片,为全院干警上好廉政教育开学第一课,进一步增强干警司法廉洁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底线。

此次播放的警示教育片选取海南纪检监察机关近年来查办的重大要案和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微腐败案件,极具代表性、警示性,有极强的警示教育意义。

海南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凤超要求,海南法院要深刻吸取张家慧等司法腐败案件的惨痛教训,切实加强司法廉洁建设,守住廉洁作风底线,扎实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零容忍严惩司法腐败,努力做到知耻、知悔、知敬、

知畏、知止、知责、知进,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也不能松懈。“七知”要求,法官既要有职业荣誉感,也要有褻渎职责的廉耻感,以司法腐败为耻,以司法廉洁为荣;要对有违共产党员初心使命的行为感到后悔,防微杜渐,将司法腐败扼杀在摇篮里;要对法官职业和审判权心存敬畏之心,对经办的案件时刻警醒敬业;要履行好法官的职责,锚定法律红线,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对自己滑向犯罪深渊的行为及时停止,悬崖勒马;要明确法官职业责任重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法官要有进取心,对承办的案件要研究透彻,做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要切实贯彻“三性统一”司法理念,驰而不息地狠抓司法作风建设,不断提高司法能力,努力打造海南自贸港一流法院。



针对春节返程期间车流量大和醉驾、超速等违法行为易多发情况,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在主要路段设置卡点开展严查和宣传专项活动,对违法驾驶员和乘车人员先进行安全教育再处罚,取得很好效果。图为民警正在开展安全文明教育。

本报记者 李光明 本报通讯员 杨庆元 摄

永远30岁的脱贫之花黄文秀

上接第一版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无论刮风下雨,她都会挨家挨户上门走访,山路泥泞,她一脚深一脚浅的步履不会停止;贫困户不愿意她进门,她就一次、两次、三次地去,直到对方接受她;有时候,遇上贫困户去田里不在家,她也不客气,直接再赶到田间,一边帮忙干农活一边了解情况。

慢慢地,村民们对这个真诚且有着一身干劲的姑娘越来越熟悉,开始从心里接受她,黄文秀也逐渐有了一本关于全村贫困户的“账本”:百坭村共有472户2068人,建档立卡贫困户195户883人,2017年未脱贫为154户691人,因学致贫和因残、因病致贫占比最高。

驻村一年,黄文秀把全村所有的贫困户遍访了一遍又一遍。韦乃情回忆说,仅2018年,黄文秀就到她家探望了十多次,帮扶她家种上20亩油茶,并为她协调解决了养老补贴、医疗报销等问题。

从黄文秀的文章里可以看出她做时斗志昂扬的积极状态:“在我驻村满一年的那天,我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增加了两万五千公里,我简单地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心中永远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快’。”

带领村民发展种植产业

在黄文秀担任百坭村第一书记1年又82天时,她已帮助全村88户418人脱贫,将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到2.71%。因为,黄文秀和村两委干部一起带领群众摸索到了适合本村发展的产业——种植砂糖橘、八角、杉木等。

“群众要脱贫,增收是硬道理,村经济发展了,人民群众的收入提高了,驻村扶贫的作用才能充分体现出来。”黄文秀这样认为。

事实上,在黄文秀到来之前,百坭村已有种植砂糖橘的传统,但种植技术不行,又没销路,挣不了多少钱。黄文秀到村里开展工作后,带领村“两委”一班人外出考察学习,请技术专家到现场指导,挨家挨户宣传发动,要求党员带头示范种植,为打通市场销路,黄文秀还积极探索网上销售途径,建立起百坭村电商服务站。

经过努力,全村种植杉木从原来的8000余亩发展到2万余亩,砂糖橘从1000余亩发展到2000余亩,八角从600余亩发展到1800余亩。

发挥专业优势 永葆为农情怀

上接第一版 今年,她准备提交关于加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金融法》的建议,助力农业经济发展。

“农业农村金融的发展是提升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推动‘三农’经济发展的关键,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趋势也对农业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陈瑞爱认为,农业农村金融组织应纳入到法制化轨道之内,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在陈瑞爱看来,制定农业农村金融法应

聚焦五大方面:完善农业农村金融、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让农民贷得到、贷得好;明确不同性质金融机构服务的定位与分工,完善监管政策,在风险监管、准备金、利润等方面出台差别化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金融贷款投放;维护好土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好土地承包权,盘活土地经营权,拓宽农村地区融资渠道;对金融法律服务农产品稳产保供实施差异化监管政策,进一步调动金融机构服务的积极性;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减轻农业经营的风险。